论卡尔·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

龚天平　殷全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 武汉 430073)

摘　要: 在卡尔·波兰尼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既是一个“社会分化”的社会,也是一个“伦理碎化”的社会;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支配商品交换关系的规律也在支配人类生活,导致人类特别是劳动者道德自由的丧失,从而陷入了对“自由和责任的理解”超越了“资产阶级世界自身边界”的伦理困境;对这一伦理困境的突破方案在于以人性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即将到来的稳定时代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也是个体自由能够获得制度性保障又能达成公平的成熟社会。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是深刻的、新颖的,其中蕴含着许多有价值的洞见。但由于他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的不道德、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陷入伦理困境,都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这也导致他提出的人性社会的新社会方案陷入抽象人性论的窠臼,而他主张把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相关联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也是不科学的。

关键词: 卡尔·波兰尼;资本主义社会;不道德;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人性社会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1)01-0032-10

据英国学者蒂姆·罗根所言,在我们 21 世纪的人看来,在“资本主义出了什么毛病”这一问题上的答案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带来了物质不平等,即贫富悬殊;一是资本主义带来了道德或精神上的恶果,即道德滑坡①。由此就形成了经济学发展史上对资本主义做出激烈批判的两种传统,即贫富差距批判传统和道德批判传统。其中后一种传统在 19 至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遍重于前一种传统。而在构成后一种传统的思想家群体中,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以下简称波兰尼)无疑是一位不可略过的重要的思想家。他在其出版于 1944 年的经典名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以下简称《大转型》)以及一系列数量巨大、范围广泛的著述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猛烈的道德批判。就学界来看,目前讨论波兰尼关于“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有机社会思想、互惠经济观、市场观、“嵌入性”与“脱嵌性”思想等的学术成果比较丰富,但研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的文献尚不多见。而作为一位创作出了与马克思《资本论》和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样对经济史有巨大影响的《大转型》的著名经济学家,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思想即便在当今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仍然不乏重要启迪。因此,本文试图展示并评析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思想。

一、波兰尼对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系统的道德判断

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首先是从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系统这一层面进行的。在他那

收稿日期:2020-10-20
作者简介:龚天平,男,湖北公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经济伦理实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2BZX079)

① 蒂姆·罗根:《道德经济学家:R.H.托尼、卡尔·波兰尼与 E.P.汤普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成广元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 页。

里,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社会、市场社会等都是表示同样含义的概念。他在经济学上的巨大声誉虽然是在《大转型》面世后才赢得的,但他在该著中的思想则早在此前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萌生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道德批判的主要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给道德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使该社会演变为一个"伦理碎化"的社会。

从 1919 年起之后的 20 年中,波兰尼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道德批判时,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撰写了若干篇思路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风格一致的研讨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之伦理意义的论文。受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启发,波兰尼于 1937 年在他写作的与滕尼斯同名的论文《共同体与社会》中以市场为靶子,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激烈的道德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道德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虽然相比于以往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自由市场体制的确使经济效率快速提升,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但资本主义社会也隐藏着人类创造的自由主义文明有趋向崩溃的症候,而其崩溃的根源就在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所播下的种子。这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产生了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无法根治的两大病症:一是"社会分化",即市场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分离开来,演变为左右自然环境与人类命运的唯一力量,其结果将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走向毁灭;二是"伦理碎化",即秉持自由主义信条的市场体系创生了一个人们高度理性且只遵循效用逻辑去行动的资本主义社会,高度理性和效用逻辑使该社会道德贫乏,即不仅忽视真正的个体责任,破坏道德共同体,而且系统阻碍道德行为。伯纳德·孟德维尔曾经在《蜜蜂的寓言》中提出"私恶即公益"的命题,从而为市场体系作了言辞激烈的辩护;而波兰尼则与此相反,认为市场体系作为"撒旦的磨坊"终究是撒旦的磨坊,它把劳动者碾成乌合之众,破坏了既有社会关系,将个人美德转换成公共恶行。他说,好像一条无形的分界线一样的市场把从事日常活动的所有个人都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为了自我利益的满足,这些人不可避免地相互冲突,而冲突又必定会对同伴的利益构成损害,相反,如果一个人希望有效地减少对他人的伤害,那么他就必须彻底地抛却为同伴着想的观念,然而,拥有这种观念的个体又无法超越强而有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系统。因此,"在这种系统中,人类不允许行善,即使人类可能非常希望行善"①。

应当说,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上出现"伦理碎化"的判断不能排除他的确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道德批判,但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者还是有重大区别的。总体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高举人道主义旗帜。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坚守的道德武器,他们不仅最初开始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坚持人道主义,成熟后也仍然坚持人道主义,当然那是与科学主义辩证统一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从历史上看,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建立起这一社会并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也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摧毁了封建宗法关系,以交换价值代替了人的尊严,让那些"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转换为"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②,从而取得了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等方面的文明成果。但是,从伦理上看,资本主义社会用口头上的人道主义精心掩盖了现实社会中事实上的不人道、不道德。其不人道、不道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不道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前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体现为评价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尺度;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社会关系的反映,这种社会关系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组成的关系系统,其中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这种经济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工人阶级遭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导致两个阶级的关系不平等,造成了资本主义

---

① 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焦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4 页。

生产方式的不道德。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不人道、不道德的社会现实。

其一,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全面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道德。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主要体现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通过人的劳动产品与人、人的劳动活动与人、人的类本质与人、人与人相异化四个方面阐发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活动作为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类特性、活动产品作为人发挥类特性的结果、人的类本质及人际之间合乎人性的友善交往,本来就应是属于人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都不属于人甚至成为人的对立物即异化了。因此,造成异化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道德的社会。异化劳动理论表明,“马克思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从人和人道主义出发的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道德谴责”,“集中而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的社会伦理思想”①。

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道德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严重的道德方面的消极后果。首先,使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商业不道德。恩格斯说,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商业,而“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一方面互不信任,另一方面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②。其次,使无产阶级道德状况恶化。恩格斯说,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把“已被剥夺了面包”即因为生产资料被剥夺从而生活资料也被剥夺的无产阶级“变成了也被剥夺了道德观念的人”③,工人阶级“不仅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也遭到统治阶级的摒弃和忽视”④。其三,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撕裂,人际关系分崩离析。恩格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每个人的孤僻的、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变成为社会的基本的、普遍的原则,使人类分散成一个个都抱有其特殊生活原则和特殊目的的分子,社会变得“一盘散沙”,公开宣告开始“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成为“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⑤的社会。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不道德的社会现实之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波兰尼则将其原因归结为自由市场的兴起。其实,虽然自由市场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确有时间上的同步性,然而这两者并没有天生的一致性或契合性。自由市场的确也因其运行机制的原因会给社会带来道德上的双重后果,即积极后果和消极后果,但这种双重后果到底哪方面占优势,占优势的一方发挥到什么程度,是与它所处社会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当其所处社会的生产方式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也能得到道德上的正向评价,那么它就能播下积极的种子,否则,它就是不道德的。所以,自由市场“决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⑥,但当它兴起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处于摧毁封建宗法社会的生产方式,确立自己在社会的主导或统治地位的革命时期,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也是道德的,两者此时的结合就能相互激发自己的道德积极性,而其道德上的消极后果就能被遏制在最低限度。而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后它就从积极、进步的革命力量转化为消极保守的势力,这是与历史发展进程背道而驰也是不道德的,两者此时的结合就使市场的道德消极性得以充分暴露,而其道德上的积极后果也被窒息。波兰尼由于漠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得历史辩证法,因而尽管他指控了资本主义社会不道德的社会现实,但还是与真理相距甚远。

二、波兰尼对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的批判

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对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作了猛烈批判。据研

---

① 安启念:《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55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428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04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24 页。

究波兰尼的英国学者加雷斯·戴尔所言,波兰尼在 1944 年前就创作了数量巨大、范围广泛的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地体现了他的不能忽视的三大重要贡献:参与社会主义“核算争论”、从哲学上反思资本主义社会伦理、推崇基督教社会主义①。就在第二大贡献中,波兰尼批判了资产阶级以道德自由观为核心的道德哲学。

第一,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在理解自由和责任时超越了资产阶级世界自身的边界。波兰尼首先通过《论自由》一文批判了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他年轻时信仰的是只有个人才是道德责任主体,后来对此作了修正,转而认为道德生活的基础并不只有不受干预的消极自由,应该还包括国家和社会,它们不能被驱逐出道德领域。随后,他以个体自由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为主题,对现代伦理学的演变及其局限作了探讨,认为加尔文主义贬抑作为道德责任主体的集体,过于强调个体责任;卢梭社会契约论以公意的形式把个体自由化转为社会整体的自由,个体与社会都只是从形式上扮演了某种角色;康德通过“道德律令”展示了个体德性与社会认同之间的悖论,但其中个人的道德动机与社会的联系消失了,导致个人与其所属国家、与其必然具有的社会功能的联系被抽象化地演绎为义务问题,从而使个体自由被置换为纯粹个人的内部或心灵自由,而这实质上消解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卢梭、康德虽然没有解决个体自由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但他们的工作令人尊敬,而当时时代的趋势则是钳制这一矛盾,如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利己主义徒有其表地诠释自由,无政府主义蔑视自由,宗教冥想虚化自由,它们都遮蔽了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最终只会对作为道德主体的自我构成伤害,从而陷入“资产阶级对自由和责任的理解超越了资产阶级世界自身的边界”②这一困境之中。

第二,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陷入困境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支配商品交换关系的规律也在支配人类生活。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为何陷入无法通达现实的困境?波兰尼试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滕尼斯那里寻找原因及其解决办法。首先,他吸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既是无政府主义的也是限制人类自由的观点,还赞赏他们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的构想。他对恩格斯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的阐述很感兴趣。恩格斯认为,原始共产主义以没有阶级和阶级统治现象而从本质上区别于后来的所有阶级社会,人际交往以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为特征。波兰尼将原始共产主义界定为“人际化的透明性”社会,将阶级社会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或市场社会转换为“非人化的不透明性”社会,认为这两类社会之间有一个断裂点,前一类社会普遍流行公社性社会交往关系。波兰尼还认为马克思精确地论述了他眼中的表现为人际关系的外部和客观特点的“社会现实”,他找到的依据是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之“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的“生产”部分的论述:

>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 18 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M—2]才能独立的动物。③

波兰尼认为,马克思的上述论述集中地体现了 18 世纪以前个人从属于一个相对较大的整体,是没有分化的社会,人际间是相互联系的;此后则是孤立个人的时代,社会联系都只是达到私人目的的手段,人际

---

① 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第 25 页。
② 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第 4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6 页。

间是疏离化、原子化的。其次,波兰尼也借鉴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看法。在滕尼斯看来,现代社会的行动主义倾向使个人行为从习俗规范中得到解放,从而能够根据自我意志自主自决,但这也导致“共同体”的边缘化,本来共同体作为一种小规模、人际交往既直接又透明的组织形式,其目标与个人目标是同一化的,而现代社会则使两者分离了。这种分离不应得到正面评价。因此,社会应该重建并走向一种更高形式的共同体。波兰尼不仅探究了滕尼斯的意图,还以滕尼斯的视角理解了恩格斯的“原始共产主义”概念并挖掘了滕尼斯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滕尼斯认为,“社会现实”在资本主义社会既被承认但同时又被否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仅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在那里,那种不受交换和作为“虚拟商品”的货币支配而“直接进行面对面个人交往的权利”①被剥夺了,人类被降格为“抽象的功能性单元”而成为一种与人类的真正本质相抵牾的异化的存在。波兰尼认为正是这一点导致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对于这种困境产生的原因,他在诠释马克思的类似论述时总结道,是由于有用物品向商品、工具向资本、人类需要向需求、人类创造性活动向劳动力、个体合作向“人类所创造的物品的非人化价值交换”转变,总之,是由于“支配商品交换关系的规律也在支配着人类”②。

第三,支配商品交换关系的规律也支配人类生活的社会现实导致人类特别是劳动者道德自由的丧失。支配商品交换关系的规律何以能支配着人类生活? 波兰尼在他的《共同体与社会》一文中说,是因为“客观的物质力量导致手段统治目的”③,这种客观的物质力量就是商品、资本及商品交换关系。而这又导致两大后果:一是道德选择的自由空间及人“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的尊严”④消失;二是本应是目的本身的劳动被当成商品拖入交换,这使得经济手段宰制道德目的,伤害了劳动者的人格和社会结构。不仅如此,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使人与人相互疏离,市场把社会经济关系及资本主义世界神秘化,从而使人们的道德敏感性受到妨碍。这说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道德哲学关于“每个人都能自由追求自己目标”的道德承诺就是一个泡影。因而,在波兰尼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既限制了人们道德选择的空间,也使人们难以在市场世界确立道德高地⑤。

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道德自由的丧失和道德高地的缺席,一方面使辛苦创造产品的劳动者与靠整个社会为生的消费者的角色错置,前者沦为与寄生虫无异的角色而饱受污蔑,后者似乎尽心尽意为他人服务而广受赞誉;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社会里人际交往是通过市场来联结并展开的,因而每一个体都成为只关心自我偏好满足的孤立的经济人,从而导致狭隘的利己主义伦理广为流行。而这种利己主义伦理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如经济与政治裂解,社会撕裂,人类再也没有可以把自己团结在一起的共同目标,从而处于危险之中。总之,在波兰尼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处于表面上高呼自由、平等、博爱实际上又阻碍其实现的伦理困境中的社会。

众所周知,马克思也对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的欺骗性、虚伪性作了猛烈批判,但他认为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的欺骗性、虚伪性是出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需要。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视为建立在“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⑥,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享有的自由”,而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⑦。这种自由相对于劳动者来说是受剥削的自由,因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被

---

① 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第 43 页。
② 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第 44 页。
③ 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第 44 页。
④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冯钢、刘阳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18 页。
⑤ 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第 45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73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757 页。

剥削者不自由,事实上所有的人包括资本家也不自由,自由的真正拥有者是资本。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这种社会条件的基础上的,即是说物对人的奴役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建制,是极其强大的力量。这种物就是资本及其统治架构,它最终彻底地取消了任何个人自由,即物的力量不仅使工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受其支配,而且资本家为了发财和享乐也不得不受其支配。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之所以陷入困境,与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不人道、不道德的社会现实之原因一样,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

与马克思把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陷入困境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波兰尼则将其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关系。其实,商品交换关系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商品生产及交换同一般经济活动一样,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进行的价值创造、转化和实现的活动,是人把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因此,商品生产及交换尽管在不同时代发展程度不同,但也是与动物相比为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商品交换关系是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市场就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人们在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换就建立起了交换关系,而这种关系其实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已经发生了。所以,与市场一样,商品交换关系也受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制约。就其与自由的关系来看,商品交换关系本来就以进入市场参与商品交换的主体的自我意志为基础,即交换主体在自我意志支配下自主决断、选择而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干预,从而满足交换主体各自的需要和利益。即是说,自由构成商品交换发生的原因,商品交换本身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特性的发挥和展示。但因为商品交换受制于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它与自由就构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当它与增进自由的生产方式相结合时,它就能极大扩展人的自由;当它与限制自由的生产方式相结合时,它就会极大缩减甚至钳制人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包括道德自由之所以是虚假的自由,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掩盖了真正的自由。因而,波兰尼在寻找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陷入困境的原因时,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关系中去寻找,而不是继续追踪这种商品交换关系的最终决定性根源,这虽然没有找错地方但也不过是浅尝辄止。

三、波兰尼为资本主义社会突破伦理困境开出的未来方案

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思想,不仅包括前文所述的内容,也包括他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的突破伦理困境的方案,这就是他希望以他所理解的人性社会来替代资本主义社会。

第一,人性社会即具有独特人性关系的社会。波兰尼理解人性社会时把自由与人性直接等同,认为当人类愈直接、愈自觉地参与社会关系时,人类就越贴近生活,变得越自由越人性化。因此,人性社会就是指建立了“人们之间的独特人性关系”①的社会,“独特人性关系”是指“人际关系……直接、无中介、追求人类利益,以及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②。他把这种人性社会直接界定为社会主义社会,认为作为一种制度架构,社会主义社会个人目标与共同体目标具有协调性,它使得每个人都能自觉地把两者统一起来,以共同体目标为个人目标。它崇尚那种向来被当作“重视凝聚力的生活方式”和“被扩展到整个人类的家庭生活”③。总之,在波兰尼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个人生活与社会现实、道德自由与道德责任是统一的,人们积极参与人际交往也相互担责,它的自由就意味着凭借担当责任和践履义务而实现的“社群主义—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自由”④,而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承诺的那种卸却责任和义务的自由。

---

①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第 240 页。

② 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第 47 页。

③ 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第 48 页。

④ 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第 48 页。

为了清晰地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倾向,波兰尼还在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之间搭建了一座能够毫无障碍地贯通的桥梁,“社会主义不过是那种在西欧一直与基督教传统相联系的努力的延续”①,而社会主义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进行文化甚至精神革命。在《法西斯主义的实质》等文献中,波兰尼认为,基督教之灵魂学说既发展了个体道德责任也确立了平等原则,但基督教伦理因为产生它的社会过于简单而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同时它也不承认“社会现实”。只有社会主义既承认“社会现实”又建基于平等主义和个体主义伦理之上,“社会主义是一项努力将个体的自主性和道德的社群性整合起来的社会运动,运动的目标是致力于尊重个性、社群性、民主、平等和自由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即“社群主义—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意义上的价值观,但它们“植根于基督教关于兄弟情谊和上帝恩典的教义中”,因为基督教主张,“每一个人都有灵魂”,这就意味着“生而平等”;但“灵魂可能得到拯救也可能误入迷途”,这又意味着“自由和责任”②。这样,波兰尼就以自己的方式把基督教、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整合到一起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第二,社会主义是即将到来的稳定时代之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波兰尼之所以希冀资本主义社会被作为人性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是因为他一生都在寻求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共同体。波兰尼在 20 世纪初转向了与爱德华·伯恩斯坦、弗朗茨·奥本海默等具有密切联系的自由社会主义思潮,这种思潮认为当时有一种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团结伦理为中心的理想主义逻辑运动”和“重要生产工具的社会化”③。基于此,波兰尼认为,未来社会将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那种资本集中于个体所有者手中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而是社会性而非个体性将成为判断人类价值的重要标准,人类必将会越来越具有集体主义色彩。1909 年他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危机》中预测:“在即将到来的稳定的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将是统治性的意识形态。”④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在《大转型》中如此界定:“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有意识地试图使市场从属于一个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⑤

然而,与其所追寻的共同体相冲突的是,波兰尼一生又极为尊崇个体责任伦理。而个体责任伦理不仅与资本主义不相容,与集体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不相容。这就构成困扰波兰尼一生的“个体责任的伦理与‘社会现实’”⑥的冲突。就“社会现实”来看,更具集体主义色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就伦理上来看,他又崇尚个体主义,倡导个体责任伦理,企图在这个社会中寻找到如何使决定论(相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客观规律和因果联系)与意志论(相信道德自决能力和个体责任意识)得到有效协调的途径。他认为,个体责任伦理理念会越来越主导个体行为,因为人类信仰的本质就是个人对自身行为应该担当责任的自决意识,个体所具备的独立良知能够使个人意识到自身是一个有责任担当的行为主体,每个人都渴望过有道德的生活,而践行个体责任就是道德生活的本质。

为了解决上述冲突,波兰尼阐发了他的宗教观。因为当时基督教保守主义者认为道德堕落是因为否定传统宗教信仰带来的,指责社会主义者破坏了匈牙利人眼中的“宗教伦理”。波兰尼则回应到,恰恰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者的宗教信仰体系损坏了道德规范,削弱了人们对自身行为的应有责任感。“宗教伦理”摧毁了道德共同体和道德自由这些真正的伦理生活的基础:“一方面,宗教伦理崇尚和加剧了民族性与阶级性的对立,因而破坏了道德共同体;另一方面,宗教伦理只允许人们在既定的‘善’与‘恶’

---

①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第 240 页。
② 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第 53 页。
③ 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第 8—9 页。
④ 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第 9 页。
⑤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第 240 页。
⑥ 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第 9 页。

之间做出选择,而禁止人类自主决定何为‘善’‘恶’(这一问题是由权威机构或传统决定的),因而破坏了道德自由。”①虽然波兰尼如此严厉地批判了宗教伦理,但是他并不完全否定基督教,相反他把宗教视为社会不可缺少的给人们提供道德目标感的建构物,他透过希腊人的视角,把基督教的核心功能定位为整合个人与社会从而创造一个由那些富有道德责任感的个人所构成的共同体。因此,在波兰尼那里,解决道德自由丧失和个体责任消弭、增强人际关联、拥有真正的伦理生活的根本途径就是塑造道德共同体。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是个体自由能够获得制度性保障又能达成公平的成熟社会。在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倾向时,波兰尼也表达了他对自由的理解。其实,波兰尼哲学思索的核心就是自由及个人在社会里如何获得自由的问题,他特别期待搞清“复杂社会里的自由”及个人的角色。他认为,如果人在人际交往中能够获得最为基本的尊重,具有尊严感,那么人就可以维系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人而言,德性构成其特性,不能以经济发展为由而败坏它。自由自主是人成为责任主体的根本理由。只有当个人道德自由得到实现,道德共同体与伦理共同体才有望构建。在波兰尼看来,人之内在心灵必须免于国家和市场的入侵、干预,其自我命运只有他自身才能主宰、掌控。像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人类成为异化的存在,社会听命于资本,为资本逻辑所主导,是完全背离于人的自由本质的。

在波兰尼看来,自由于人而言极为重要,因为它是“人的精神本质”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性。所谓自由即是“遵循个人良知和拥有个人信念的能力:能够辨别是非、坚持己见”③。他认为,在旧社会的废墟之中正在浮现新社会的基石,即有效的人际合作以及个人按照自身意愿组织自己生活的自由,而这正是化解文明崩溃危机、重建新的社会共同体的基本前提。自由具有制度和道德两个层面。就制度层面来看,规制既是对自由的扩展也是对自由的限制,因此它对于自由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寻求“自由的损失和获得之间的平衡”④;道德层面的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我们出于它们自身的原因而珍视它们,而“公民权利、私人企业和工资制度熔铸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大大有利于道德自由和精神独立”⑤。

那么,自由在复杂社会如何得到保证?波兰尼讨论了自由与国家权力规制和管控的关系。本来,波兰尼通过考察经济史后认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出现其实是因为政府出于非经济目的而有意为之甚至有时是粗暴干预的结果,而市场出现后与国家分离,经济脱嵌于社会,导致自由丧失。但与此同时,市场化也激起了社会的自我保护。社会的自我保护表现为国家权力规制和管控,它使得市场嵌入于社会系统。而市场对于社会系统的嵌入,可以成为一个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之时代的开端,新时代的自由包括:与以往任何时候相较都更广普化存在的“法律的和实际的自由”,不只以少数人而是以所有人都获得自由为目的的“规制和控制”⑥。后者看起来是对自由的限制,但由于经济体系嵌入于社会体系,使得制度化的国家权力规制和管控与经济体系融为一体,因而后者实质上构成个人自由的保障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人们想要创造和保卫的自由与未来可能收获的自由是正相关关系⑦。而个体自由获得制度性的保障又是社会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在这种社会里,自由已不再是特权者的附属物,而是“一种远远超出了政治领域狭隘界线伸展至社会自身内部组

① 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第 10—11 页。
② 卡尔·波兰尼:《新西方论》,潘一禾、刘岩译,深圳:海天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5 页。
③ 卡尔·波兰尼:《新西方论》,第 46 页。
④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第 260 页。
⑤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第 260 页。
⑥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第 262 页。
⑦ 卡尔·波兰尼:《新西方论》,第 169 页。

织的规范性权利”,“是由工业社会向所有人提供的闲暇和保障所产生的”①新式自由,这样的社会不仅自由而且公平。

应该说,波兰尼的上述思想是很有价值的,但他关于人性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仍然摆脱不了抽象性、虚构性。在我们看来,人性首先是一个综合性系统。由于人有类、群体、个体三种存在样态,相应地,人性就是一个由类人性、群体人性、个体人性构成的综合性系统。类人性表现为自然人性,是人在与动物相区别的维度上表现出来的人性,恩格斯的“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②这一判断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群体人性表现为社会人性,是人在与不同于其所属群体的其他群体相区别的维度上表现出来的人性,马克思曾说人不仅有合群性而且还有使自己独立的社会性,这就是在揭示人的群体人性;个体人性表现为人的个性,是人在与其他个体相区别的维度上表现出来的人性,马克思的个人之特殊人格的本质“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体,而是它的社会特质”③一语就是在阐发人的个体人性。然而,人性中的决定性因素既不是自然人性也不是个体人性,而是社会人性。也就是说,人性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理解和说明人性的钥匙只能到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去寻找,而现实社会生活就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而这些条件其实就是一定的生产方式。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性归结为受生产方式决定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本性不同,波兰尼把人性与自由等同,认为人性就是人的良知、信念和出于良心行事的能力。其实,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建立在本质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抽象人性论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的抽象人性论先假设有一个万古不变的人性,然后以此来说明人类历史,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不过是人性的丧失与复归,人性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决定力量而且是历史发展的评价尺度,主张通过教育并诉诸理性、道德、宗教等,来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和理想人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不过是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虚构出来的思想武器,其实质是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人学工具。正如肖恩·塞耶斯所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不同意“在普遍绝对的人性概念中追寻社会理论和道德价值的基础”,而是对人性包括“人类的诸种需求、诸种能力和诸种力量”进行历史的考察。因此,“马克思主义包括了人性的历史形式”④。而波兰尼正是由于不懂得这一点,从而也陷入了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窠臼。

同时,波兰尼提出社会主义必须与基督教相关联并进行文化甚至精神革命,才能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并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观点也是不科学的。不可否认,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向合乎人性的人复归的社会。也可能是因此之故,波兰尼才认为,马克思眼里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是人性社会。但这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的思想,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他则认为,一个社会是否合乎人性不是从人性本身、道德、宗教来判断的,而是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存在是否合乎人性上来判断。人性改变必须与社会发展同步进行,两者不能相脱离。要消灭一个社会的非人性、不道德的现象,不能诉诸道德或宗教,而必须消灭导致这种非人性状况得以产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存在的根源。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之后诞生的新的社会形态,在其诞生之前,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克服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必须由这种生产方式自己培育的工人

---

①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第 26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 页。
④ 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冯颜利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2 页。

阶级联合起来,以暴力革命的方式,颠覆已经由变革者蜕化为保守者的资本家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自己的政权。这个政权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其生产方式是从资本主义继承而来的发达的生产力与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实行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社会是按需分配)为内容的生产关系相统一,并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地调节的生产方式,其基本原则则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社会既是历史规律运行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结晶。

四、结　语

上文我们从三个方面展示了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思想,并从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角度评析了他的这种思想。实事求是地说,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是深刻的、新颖的,其中蕴含着许多有价值的洞见。然而,他把资本主义社会滑向“伦理碎化”的原因归结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所播下的种子,把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陷入困境的原因归溯为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关系,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人性社会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的途径归结为要与基督教相关联并进行文化甚至精神革命。这其实并没有挖掘到真正的根源。我们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我们分析道德、自由、人性等问题的根本方法论基础,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不人道、不道德,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陷入伦理困境,还是资产阶级人性观陷入抽象、虚构泥潭,都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波兰尼由于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使他没有找到资本主义社会整体不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自由观陷入伦理困境的真正原因,也使他提出的人性社会的新社会方案陷入抽象人性论的窠臼,而他主张把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相关联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也是不科学的。

On Karl Polanyi's Moral Criticism on Capitalist Society

Gong Tianping, Yin Quanzh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In Karl Polanyi's view, capitalist society is both a society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a society of "ethical fragmentation". As the law that governs the commodity exchange relations in capitalist society also dominates human life, the bourgeois view of moral freedom leads to the loss of moral freedom on the part of human beings, especially the laborers, thus being caught in the ethical dilemma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transcends "the bourgeois world's own boundaries". The breakthrough plan for this ethical dilemma lies in the replacement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by the humane society, that is, the socialist society. Socialism is the dominant ideology of the coming era of stability, and it is also a mature society in which individual freedom can obtai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achieve fairness. Polanyi's moral criticism of capitalist society is profound and novel, which contains many valuable insights. However, he did not underst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r did he understand that the immorality of capitalist society and the ethical dilemma of the bourgeois view on moral freedom are both caused by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his also led the new social program of humane society that he had proposed to the set pattern of the view on abstract human nature. His argument that socialism should be associated with Christianity so as to take the place of capitalist society is also unscientific.

Key words: Karl Polanyi (卡尔·波兰尼), capitalist society, immorality, bourgeois view of moral freedom, humane society

(责任编辑　刘曙光)